

绪 论

在历史学著作中，关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中最早的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阐述，有许多并不是真正专门化的。尤其在对人类早期的一些国家的论述中，这种情况比较明显。而事实上，关于人类早期政治组织的研究，无论在一般原理或个案的问题上，都越来越形成一个具有一些十分专门化的规范的研究领域。在这项研究中，那种依靠少量零星资料和凭借单一的方法来作出推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至少对某些个案来说，涉及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正如一位研究史前国家问题的美国学者哈斯所说：“由于这一领域开始试图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它正在经历着分娩前日益加剧的痛苦。”^① 这种情况实际上意味着，在目前要推进关于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包括国家）的研究，一种综合性的、深入的和比较专门化的探讨是必须的。这一点，不仅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同样高度关心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发展问题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也是如此。

本书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一种考虑下着手进行的。它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对关于人类早期国家的一般理论和早期国家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讨论；二是就中国国家起源和中国早期国家最初的

^①〔美〕乔纳森·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2页。

发展问题提出分析。鉴于前面提到的关于人类早期国家的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本书显然不可能对所有有关问题都提出肯定的意见，但是我会对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某些观点。而我认为，本书的工作如果还有其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也许主要并不是在于我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虽然对这些观点中的有一些，至少目前我本人还是比较看重的）。我所希望的本书可能具有的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读者也许会从本书的工作中对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研究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以及它所要求的极为复杂的方法有一种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促使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在更为专门化的水平上取得进展是有益的。

“早期国家”这个概念在我国史学界目前使用得还不是很多，可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而在国际学术界，近二三十年来，在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问题时，“早期国家”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国际学术界使用这个概念，导致对人类早期政治组织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考虑。首先，国际学术界把早期国家看作是人类政治组织的一种类型，它可以指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时期中出现的一些最初形成的国家，也可以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但在形成的机制和形态上与人类最早的那些国家有相似之处的各个国家社会。这样，借助于“早期国家”这个概念，人们便可以对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出现的一些相似的国家进程和国家社会作类型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对于丰富人们关于早期国家的特征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早期国家”这个概念不仅在讨论国家起源的问题时被使用，而且它往往要求研究本身伸展到国家社会形成后最初的发展问题上。因此，早期国家研究在定义上就比单纯地提国家起源研究更能够体现一种关于人类早期政治组织研究的完整的构思，从而增加这种研究的深度和对历史的说明力。事实上，当人们在与成熟的国家社会的对比中概括出早期国家这一形

态时，他们必然会对一些民族或地区历史上的一整个时期的发展得出许多有趣的认识。总之，“早期国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可以说标志着关于人类早期政治组织研究的一种新水平，同时也反映了这一研究的专门化程度的提高。很显然，对国内学者来说，吸收“早期国家”这个概念是合理的，也是有益的。从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尽管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早期国家”这个概念还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仍在讨论之中，但就是这些讨论本身也反映了关于人类早期政治研究的深化。我认为国内的研究完全可以参加这方面的讨论，并且很可能会有独特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就产生了国家的地区之一；虽然中国之出现国家还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按目前一般的认识，人类最早形成国家是在西亚和北非，时间为公元前四千纪下半叶。这时在这两个地区相继产生国家：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南部产生苏美尔国家，北非在尼罗河下游产生埃及国家。根据对考古学年代的测定，两者最早形成的时间都可上溯到公元前 3500 年；^①而许多世界史学者认为苏美尔国家产生的年代还要比埃及国家早一些，亦即在公元前 3700 年。^②这两个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也有人称之为“城市国家”，如苏美尔国家中的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拉格什和埃及国家中的涅伽达、希拉康坡里等。这可以算作人类进入国家社会的第一波。接下来，第二波便要晚至大约一千年后的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至公元前二千纪初。在这一时期中，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南

①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28、249 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1 页；〔美〕赖特：《关于国家起源的新探索》，《民族学译文集》（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年，第 114 页。

欧的地中海地区，还有东亚的中国，也都产生了国家。印度河流域最早的国家是在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等地，也是一些小国，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300 至前 1750 年。^① 地中海地区最早的国家是在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岛，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000 至前 1700 年。^② 至于中国，其最早的国家产生的年代目前还在研究中，也是本书将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在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看法中，一种较早的估计所认定的年代正是在我们所说的第二波之中。本书认为这个估计是可取的。不少西方学者和少数国内学者根据较旧的资料，倾向于把中国的商朝（约公元前 16 至前 11 世纪）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国家。这个看法可以说是过时的。目前研究的主流是关注在商朝之前的某个年代上，其中包括一些比我们所说的第二波更早的年代。从这里可以看出，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研究同关于世界上其他几个最早产生国家的地区的研究相比，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空白点似乎要更多一些。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在人类早期政治组织研究中是有其独特吸引力的课题，当然也是十分艰巨的课题。

早期国家研究在当代已经是一门跨历史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学科的学问。中外学者在这些方面曾经做出大量值得重视的工作。而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于这项研究所面临的任务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在这篇绪论中，我想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早期国家研究在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中的地位

在人类早期发展中,国家的产生是最令人感兴趣、也是最需

① 《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 346 页。

② 《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46 页。

要深入研究的现象之一。这首先是对历史学而言。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中国家的产生毫无疑问是这一民族或地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已经决定了历史学将重视对国家产生问题的研究。除此而外，历史学之重视早期国家问题，还因为国家的产生及其最初的发展至少同说明下列问题有重要的关系：

(1) 各民族历史的早期发展情况是有一些重要差异的。就进入国家社会这一点来说，在不同民族和地区中情况就可能很不一样。有些民族和地区有着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早期国家进程，但也有不少民族和地区是在邻近民族或地区的国家进程的影响下进入国家社会的。如果我们把早期国家看作是“最早的、真正原始类型的国家”^①，那么这种早期国家进程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就不是普遍的现象。因此早期国家研究对于说明人类历史中的差异性问题有重要意义。而历史学本来就是对各民族或地区历史的个性特征有特殊关注的学科。

(2) 对任何在历史上发生过早期国家进程的民族和地区来说，国家的产生都在它们的历史中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把国家的产生说成是这些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是毫不过分的。国家的产生意味着有关的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可容纳较多人口和资源、在幅员上可有极大扩张的阶段，也意味着社会的分层及相继而来的阶级区分现象可以有充分的发展，而这一点将为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文化的精致化和文明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创造条件，此外还意味着政治史在社会发展中开始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作为国家代表的大小王公贵族和官僚之流的活动，国家与外部社会间的疆域政治关系，对社会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举足轻重的作

^① [苏] 哈赞诺夫：《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268页。

用。所有这些，同国家产生前人类所拥有的相对简单的生存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在国家产生前后，各有关社会的历史的内容发生了一种非常明显的转变。而对有关社会的历史的这种转折是怎样发生的这一点作出解释，无疑是同对早期国家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国家的产生及其最初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解释为人类获得某种相对复杂的生存方式的原因。

(3) 就某个民族或地区的具体历史而言，它们从国家形成时期的各项发展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了许多“遗产”。例如历史上各国国家社会的疆域就是一项与早期“遗产”有直接关系的因素。在大多数有关的个案中，早期国家时期的地域状况都会在以后的有关国家的疆域政治和疆域地理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后果。政府形式也是如此。早期国家的政治机构形式一般都会对有关民族或地区后来的政治机构形式产生直接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甚至社会结构也是这样。早期国家时期，社会分层或阶级分化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而以后在很长时期内，有关社会的社会结构概念都会受早期国家时期开始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结构概念的支配和制约。总之，对早期国家的研究也是解释以后许多历史现象的来源的一个基础。

(4) 一些最早的早期国家进程在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特别是指前面提到的在人类进入国家的第一波和第二波中形成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出现，事实上对其周围地区（这种周围地区有时是十分广袤的）进入国家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在实际上导致了世界史上几大早期文明圈的形成。这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其后数千年世界历史的总面貌。从另一方面说，最早的早期国家本身所体现的不同的模式，对世界各文明圈在文化上的差异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模式。它同两河流域及地中海地区早期国家模式的区别是

这些早期国家模式之间最大的区别。这对以后的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形成人们常说的东西方对比有着莫大的意义，也就是说人类的早期国家进程关系到世界史中各地区关系的基本格局的形成。对那些较晚形成早期国家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来说，问题也是这样。它们形成国家较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其他地区与这些地区接触以后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从全球历史的高度看，这种关系的发生导致了世界史的新时期。可见，在世界史研究中，早期国家问题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一些民族或地区中的早期国家进程，其意义远远超过本民族或本地区历史的范围。应当指出，中国早期国家进程是属于这类早期国家进程中十分突出的一例。

早期国家研究对于历史学中的上述重要课题所具有的很强的说明力，在许多情况下还只是理论上的。就是说，这一研究究竟能够对有关的历史问题解释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它本身所达到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对于这项研究的关心，应当促使他们为此付出相应的努力。

同早期国家研究关系密切的另一个领域是人类学。对我国许多历史学者来说，人类学还是比较陌生的一门学科。现代人类学（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人类学）以研究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为其特点。同历史学相比，虽然人类学也涉及人类在历史上的各种行为表现，但它同时还关注对当代人类行为的调查与研究，从而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相似或有差异的行为作出分类，提出体现某种规律性的解释模型。早期国家问题，作为与人类政治行为相关的领域，因此也在人类学的视野中。一个世纪前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人类政治组织问题所作的研究是人类学在这方面努力的一个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代表。在他之后，人类学不断在这方面做出新的贡献，其重要性之大，以至在当代早期国家研究的

阵容中，人类学家占据的位置与历史学家不相上下。人类学在早期国家问题上的特殊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为这项研究补充了当代的实证资料。在历史学视野中，早期国家都是在较远历史时代的，其中许多实例是在人类有史时期的开端。人类学则从对于当代人类状况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些出现很晚，因而能被近代学者或一般报告人观察到的实例。如在 E. R. 塞尔维斯的一部著作中，在“原始国家”标题下列举了祖鲁(Zulu)、阿珊蒂(Ashanti)这两个在西方殖民主义到达非洲时被观察到的非洲早期国家实例。^① 在 1978 年出版的《早期国家》一书中，由来自 6 个国家的学者撰写的关于 21 个分布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早期国家个案的论文中，约有 10 个个案是属于近代以来被观察到的。它们是安柯列(Ankole)、夏威夷、约鲁巴(Yoruba)、沃尔特(Voltaic)、塔希提、库巴(Kuba)、卡察里(Kachari)、季玛(Jimma)、印加和阿兹特克。^② 这大大丰富了人们以往仅靠文献记载所获得的关于早期国家的知识。当然，也应当看到，人类学所贡献的许多报道并不是出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之手，而且也有大量的资料缺乏系统性，其往往只是零星地涉及到某地政治组织的情况。此外，这些报道中的大部分还是 19 世纪，乃至 18 世纪，或更早的。但是现代人类学在使用这些资料时一般都经过比较严格的鉴别和分析，人类学家把尽可能科学地处理这些资料作为其研究的首要规范。无疑，这部分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几乎使人们得以“直接”地考察人类政治组织的早期状况，因此是十分珍贵的。

① E. R. Service; "Profiles in Ethnolog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71. PP. 293—314; 366—386.

② H. J. M. Claessen & P. Skalnik, ed. "The Early State", Monton Publisher, Hague, 1978, P. 534.

(2) 提出各种理论解释模型以及假说。一个世纪前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一项有关人类政治社会演进的假说。摩尔根的许多结论后来没有被所有的人类学家所坚持，但提出各种假说和理论模型一直是人类学家工作的重点和特点之一，在早期国家问题上也是如此。人类学家的这些工作对早期国家研究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摩尔根学说在我国学者的早期国家研究中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就可以知道了。可以说，迄今在早期国家研究中所涉及的各种理论模型差不多都是由人类学家提出的。问题在于，人类学的理论抱负与它所拥有的资料之间几乎始终是存在矛盾的。许多理论在新资料出现后往往暴露出它们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的各种假说中都可能不可靠的成分。虽然这样，人类学的理论工作在早期国家研究中仍然是极具活力的。人类学所达到的独特的理论智慧，对于理解早期国家这样的课题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许多问题如果局限于观察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史实，将会很难产生与这类史实有关的许多构想。很显然，人类学的理论智慧正是得益于它对世界所有地区有关事实的广泛观察。

(3) 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法。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从人类行为中存在着共通的机制这一点出发，对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早期国家实例所做的分类和比较研究，这对历史学采取一种较为开阔的眼界来解决特定民族或地区的早期国家问题极富启发性。此外，比如人类学对于人类行为区分出类型的方法在早期国家研究中也常被采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三种途径，亦即早期国家进程的三种类型。这实际上也是人类学方法的一个体现。

由于人类学把早期国家问题作为它的一个重要课题，早期国家研究本身已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人类学的性质。对一项个案研究

来说，研究者固然可能根据其专业的性质选择基本上运用历史学方法来处理它，但要完全拒绝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在今天显然是不现实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考古学。作为一项旨在通过对地下出土的物质遗存的系统研究来补充（有时是修正）文献所记载的史实的科学，考古学同样也把它的目光关注在包括早期国家在内的远古时期的历史现象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近代考古学诞生至今的 150 年中，考古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了包括一些最早的早期国家在内的一系列早期国家遗迹。在人类进入国家社会的第一波和第二波中出现的苏美尔国家、埃及国家、印度河流域国家和克里特国家，都基本上是通过考古发掘认定的。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最后认定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古学的进展，包括可能有的新发现和专业研究。对考古学来说，早期国家问题是它最能显示其方法上相对于文献学的优势的领域之一。因为，国家的形成在很多个案中都要追溯到史前时期，而在史前问题上，除了传说资料外，考古学便“成了撰写早期历史的主要依据”^①。有趣的是，这一点反过来也使早期国家研究成为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动力之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便是一个例子。1959 年以来逐渐展开的对于夏代国家遗址的大规模调查和探讨，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早期青铜器时代考古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事实，即我国考古学界对早期国家问题的兴趣特别高，投入的力量也特别巨大。考古学界对我国早期国家研究已经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考古学与早期国家研究的紧密结合不仅是考古学家的事，也应当成为历史学家的规范。

同早期国家研究有关的学科，还可以举出诸如政治学、社会

① [英] 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5 页。

学、法学等等。它们都有一些概念与早期国家问题相联系。但与早期国家研究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似乎还是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一个课题同这么多学科相关，说明它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这一点毫不足怪。人类生活在国家社会中已有大约 6000 年历史，人们当然希望了解这种生活方式是如何开始的。唯其如此，人们对今天仍生活在其中的国家制度才会有更深的认识。

二、我国学者研究的成果与问题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早期国家”这个概念在国内学者中尚未被普遍使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期国家研究在我国尚未被作为一个比较专门化的研究领域确立起来。我国学者关于早期国家的研究主要是以讨论中国国家起源为课题，有关的学科是中国史中的先秦史和考古学中的新石器考古与商周考古。虽然这样，我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人类学成果仍有所吸收。因此在总的面貌上，国内学者对早期国家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工作是相似的，只是其论题涉及的面还比较小，同时在理论模型的建构上远不如国外学者那样活跃。

就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而言，国内学者的工作同国际同行相比是比较有分量的。例如，前面提到的《早期国家》一书是 70 年代末国际学术界在早期国家研究上的一本代表作。书中讨论中国个案的论文由前捷克斯洛伐克学者波柯拉（T. Pokora）撰写。从该文内容看，国际学者对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认识尚嫌空泛，讨论的问题不如国内学者具体，并且没有提出重要的肯定的结论。相比之下，国内学者的工作以在资料运用上的熟练和细致见长，并且对新资料的引用相当快，此外，所讨论的问题也比较具体，在许多问题上有明确的（尽管还存在分歧）观点。这些工作在许多

方面都带有中国历史学的特色。

但是，国内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其历史相对并不很长。在本世纪上半叶，这项研究可以说还相当沉寂。只有少量论文在讨论中国社会发展史时附带地涉及到国家问题。1928—1929年，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商代定为“氏族社会的末期”^①，暗含着中国进入国家社会是从周代开始的结论（后来郭氏改变了这个看法）。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用近代社会进化理论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提出见解，也是首次对中国早期政治组织的演化问题提出见解。但郭氏的研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研究。在我国，专门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论文在五六十年代开始出现。如戴裔煊的《古代东方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水利灌溉的关系》（1955年），吴恩裕的《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1956年），徐喜辰的《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1960年），石兴邦的《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的社会经济形态》（1964年）等。^②它们标志着早期国家研究在我国真正开始形成规模。但总的说来，一直到70年代以前，专门讨论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论文还不是很多。至7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上涉及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资料不断被发现，尤其是由于197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发掘简报的发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有关论文的数量显著增多。如佟柱臣的《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1975年），李民、文兵的《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1975年），金景芳师的《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问题的讨论》（1978年），赵希鼎的

^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16页。

^②分别见《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新建设》1956年第7期；《吉林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夏代是中国国家的起源》（1979 年）等，^① 以及大量讨论夏文化、夏史、古史分期问题和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论文（其中包括对 1977 年发现的登封告城遗址的报道和讨论以及对大汶口文化性质的讨论）。在这一时期的论文中，与中国国家起源有关的问题大体上都已提了出来，并作了深入的讨论和辩论，成就是重要的。就对中国国家产生的年代的估计而言，这一时期工作的主流是与夏代相联系的。

80 年代以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出现空前热烈的局面，在研究的深度上超过了 70 年代。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以下几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1）在发现和整理有关的考古资料方面继续做出可观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报告和研究，关于夏文化分布区域及夏商时期中原的邻境文化的研究，关于淮阳龙山文化古城等一批古代城址的报告和研究，关于汤都的讨论，关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报告和研究，关于偃师商城的报告和研究等。（2）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为线索，把对中国国家形成年代的估计提前。这在 70 年代后期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文发现后会由唐兰做过较有影响的工作。^② 80 年代则以田昌五为代表提出即使在中原地区，最早的“奴隶制部落王国”也出现在 5000 年前的传说时期，早于夏代。^③ 虽然这种看法迄今尚未有更多的学者赞同，但它有值得注意的地方。（3）注意到在中原的周边地区较早发生形成国家的因素的可能性问题。这主要是在发现江南的良渚文化和辽西的红山文化中所包含的某些可能与复

① 分别见《文物》1975 年第 6 期；《郑州大学学报》1975 年第 4 期；《吉林大学学报》1978 年第 5—6 期；《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 1 期。

② 唐兰：《再论大汶口文化的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光明日报》1978 年 2 月 23 日。

③ 田昌五：《中国奴隶制的特点和发展阶段问题》，《人文杂志》增刊，1982 年。

杂政治制度有关的内涵后出现的一种动向，由此而提出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的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其意义极为重大。（4）开始涉及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特征问题。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争议甚多。所争议的问题包括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是一种以中央集权的和专制的权力为特征的较大的国家呢，还是由众多如同世界其他地区许多早期国家那样的城邦国家或称“方国”组成的联盟？这种争论表明，研究者已注意到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国家进程可能有的模式上的不同。与此相联系，50年代以来为学者们长期引用的部落联盟模式对于中国个案的适用性问题开始受到质疑。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部分学者正在以酋邦理论来解释中国早期国家进程。^①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早期国家进程在世界同类进程中的位置予以重新排队的一种尝试。以上提到的这些探讨都超出了单纯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范围，是国内早期国家研究向更加专门化方向发展的表现。（5）一些学者开始介绍当代国际早期国家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这很可能会导致国内的这类研究越来越普遍地同国际学术界的工作相衔接，应该说，这对于我国早期国家研究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80年代以来发表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的论文甚多，不胜枚举。其中可以提出来引起注意的，有洪家义的《中国国家的形成及其特点》（1980年）、林志纯的《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1980年）、赵世超的《夏代奴隶制国家形成标志复议》（1981年）、田昌五的《中国奴隶制的特点和发展阶段问题》（1982年）、姚政的《试论夏代国家的形成》（1982年）、王震中的《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1983年）、杨升南的《卜辞所

^①参见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见诸侯对商王朝的臣属关系》（1983年）、吕绍纲的《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1983年）、林沄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1986年）、宋瑞芝的《对外防御和对外征服在从氏族到国家产生中的作用》（1987年）、谢维扬的《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1987年），以及90年代发表的叶文宪的《中国国家形成之路》（1990年）、谢维扬的《酋邦过渡性与非过渡性》（1992年）等。^①此外，美籍学者张光直的《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1983年）、杜正胜的《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1991年）也是这一时期中的重要论文。^②所有这些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早期国家研究的最新成果。

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的早期国家研究还不是很成熟的。在我国的早期国家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许多国内学者的研究在理论语言上呈现“老化”的现象。国际学术界近二三十年来在早期国家理论的研究中有许多重要成果，其中有些是积极的，但在国内工作中对此反映得还很少，即便是与之争辩也很少看到。国内大多数学者所熟悉的和较多引用的还是摩尔根在一百年前提出的理论和他所报道的事实。摩尔根的理论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肯定，其中有些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早期国家的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摩尔根对有关资料的搜集不可能做到

^① 分别见《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同上；《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吉林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湖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学术月刊》1992年第2期。

^②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第27—56页；《考古》1991年第1期。

十分全面，在对资料的处理上也有一些失误。这必然为他的理论模型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从科学发展的规律说，随着整整一个世纪中新鲜资料的不断涌现，以及对有关资料的理解的不断调整，摩尔根的模式被一些新的模型所补充和修正，这应该是不可奇怪的。因此，没有理由拒绝讨论摩尔根之后在早期国家理论中出现的各种新的构思，至少应当在辨别的基础上科学地吸收这些构思中合理的成分。对摩尔根的工作，也应当结合一百年来出现的新资料，对其得失作出恰如其分的清理。这对于我国早期国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的一些民族学家近年来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88 年童恩正发表《摩尔根的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一文，在国内首次全面分析了摩尔根学说的成就与失误。他指出，摩尔根学说长期以来在我国民族学的“各个方面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有的研究者在开展民族调查之前，就预先确定了‘母系’、‘父系’、‘部落联盟’、‘家长奴隶制’等最终的结论，调查的目的不过是用一点新的资料再一次证明这种模式的正确，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的问题”。^①这实际上也是在我国早期国家研究中可以看到的一种弊病。童恩正提到的“部落联盟”这个概念，恰恰是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被许多学者奉为圭臬的，在运用时几乎不加分辨。我在 1987 年撰文指出，部落联盟理论对于中国早期国家进程并不适用，而摩尔根本人也从未认为部落联盟制度是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②对摩尔根理论模型的不加分辨地应用，不仅导致对中国事实的曲解，而且也使该理论模型本身的含义模糊不清。这一点，应当引起国

^①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15—354 页。

^② 参见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 5 期。

内学者的深思。

我国早期国家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所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充分。总的来说，我国学者对世界各地早期国家个案的了解还很有限。我们所熟悉的主要是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到过的古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国家等个案。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对于同中国历史上各时期早期国家个案的比较也还很薄弱。比如在蒙古和后金等少数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之间是有许多可比较的相似点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目前还没有真正系统地展开。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在讨论中国早期国家问题时必须用很多篇幅去论述其他地区以及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的有关个案；这当然应当根据每次研究的具体计划来确定。但是，作为研究的基础，对于世界各地和不同历史时期中早期国家个案的了解与比较研究，无疑是当代早期国家研究专门化的一个标志。离开这一点，将对早期国家研究中的一些较新的、重要的概念产生隔膜。例如“酋邦”这个概念在现代早期国家研究中被证明是有很强说明力的，但是国内学者大多数对此还比较陌生，其原因之一就是对许多个案缺乏了解。因此我感到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对我国早期国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已是当务之急。按照本书最初的设想，将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国际学术界报道过的一些重要的个案，以及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中的重要个案。这对于读者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研究所涉及的种种问题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遗憾的是因为篇幅关系不能将这些章节纳入本书中。但是我将许多地方提到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同时有些个案在一些章节中也已经比较详细地谈到了。

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都同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有关。在我国，从事早期国家研究的主要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因此，在研究时是否充分注意到人类学的有关成果，这对我国早期国家研